

凌晨1点，倪和平给王思蜀打电话，说欧阳健要自杀。

王思蜀吓得从床上坐起来，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倪和平没力气解释，“让她明天来深圳，来了再说。”

王思蜀嘴里嘟囔：“这个项茹梅，作鬼！”

二

欧阳健是倪和平的初恋。

两人是重庆二中同学。二中是“贵族中学”，学生有两类，一类是欧阳健这样学习好的，另一类是倪和平那样家庭有背景的。他俩不是一类。1966年毕业，赶上“文革”，不高考了，大串联，把他们“串”在一起。

串联队伍是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，他们都是骨干。两人都识谱。但倪和平只识简谱，欧阳健则习惯用五线谱写曲，之后再翻译成简谱跟倪和平讨论。倪和平不得不刮目相看，身上的傲气减退一半。“长征”途中，二人经常于煤油灯下讨论曲谱，挨得近，彼此能感觉到对方身上的体温。

前几年“文革”歌曲回潮，倪和平给欧阳健打电话，说你听见了吧，现在歌舞厅流行的那个歌曲还是你当年谱曲的呢。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欧阳健问。

“打官司呀，”倪和平说，“要版税呀。”

欧阳健“喊”了一声。

串联的高潮是到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接见。疯狂之后回到重庆，发现天翻地覆，倪和平的父亲已被揪斗。胸前挂个大牌子，“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倪振威”，名字上还打了红叉叉，像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犯人。

倪和平顿时失去了所有光环，缩在家里不出来。欧阳健也不用自己写曲了。街上冒出许多革命歌曲，有些是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歌，改动一下歌词，当新歌唱；有的是新写的，但具体谁写的不明确，一律是“集体作曲”。他也不拉小提琴了。小提琴资产阶级情调重，声音小，不适合伴奏革命歌曲。欧阳健改唱词，居然唱出了名气。保留节目是《赞歌》，前面的那一段“啊……”九曲十八弯，把听众带到离太阳很近的地方。

项茹梅是欧阳健的忠实“粉丝”。她低两届，年龄小，个子也小，跟欧阳健不在一个“档次”。出身也不一样。项茹梅是在坡坡屋长大的。重庆的坡坡屋相当于北方的大杂院，居住的大多是挑夫和纤夫。坡坡屋顾名思义，沿山坡搭建，地斜，屋顶也斜，随时要倒的样子。离码头不远，因此这里的孩子读书少，见识却不少。到项茹梅这一代，也能上学了，项茹梅接触到坡坡屋以外的孩子。他们不拖鼻涕，下雨天有红色绿色的小胶靴穿。哪像项茹梅，穿哥哥剩下的元宝口胶鞋，不好看，还



内容简介：

今年是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，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惑之年。作者经历丰富，见证了深圳这座城市的发展繁荣，并将许多真实事例写成了一系列“深圳故事”。相互关联又独立成章的五个故事，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独特侧面。特区的腾飞故事，也是特区开拓者的命运故事，作者写就这本《深圳故事》，以此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文学记忆。

经常灌水。

“文革”前夕，项茹梅得益于“就近入学”的新政策，也升入二中。但他们一看就与老二中的学生不同。幸好“文革”爆发，抹平了二者的界限。老生成立战斗队，新生不甘落后，也成立战斗队，并且新生来自五湖四海，更有战斗力，成为急先锋。

项茹梅是在欧阳健的《赞歌》声中冷静下来的。她发现世界上还有比“造反”更美好的东西。比如《赞歌》，比如欧阳健。她感觉欧阳健跟她哥哥不一样，跟坡坡屋所有的男人都不一样。

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，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”第一批上山下乡轮不到项茹梅，但她看到光荣榜中有“欧阳健”，也去报名，坚决要求上山下乡。

那天项茹梅早早上车。她不像别的同学跟父母依依不舍，她只想跟欧阳健在一起。

项茹梅坐到最后一排。她想象高大的欧阳健应该坐在这一排。她知道欧阳健不认识她，但只要坐到一起，总有机会说话。伟大领袖好呀，项茹梅想，要是没有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，她不可能跟欧阳健坐到一起。

大部分同学都上车了，欧阳健还没露面。难道他不上这辆车？或者因为什么原因不去了？不

文

摘

南橘北枳

会呀，名单上写得清清楚楚，还能错？万一呢？万一欧阳健真的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不去了，我是不是也不去了？不行吗？

欧阳健终于出现。

欧阳健是名人，谁都认识，一路过来不断跟人打招呼。

车上只剩下最后一排两个空位，正好在项茹梅两边。

欧阳健上车。一面跟大家打招呼，一面往后看，往项茹梅这里看。看得项茹梅顿时感觉心脏扑通直跳。

欧阳健开始往里面移动。手里有一个包和一个黑色的匣子，其他行李肯定放到车顶上了。项茹梅知道那匣子里面是小提琴。欧阳健就这样一手提着包一手举着小提琴往里面移动，只要再走几步就到达最后一排了，只要到达最后一排，欧阳健就会在项茹梅旁边坐下，他们彼此一打招呼，就算正式认识了。

“欧阳，这里。”

突然，一个声音划破了车厢。欧阳健回头，向车厢前面走去。

项茹梅这才发现，坐在第一排的那个披着军大衣的人已经回过头来，举一张灿烂的笑脸迎着欧阳健。这是一张女人的脸，刚才项茹梅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个女的旁边还有一个空座，空座上放着一个箱子一样的东西。现在，她把箱子搬起来，原来是一个手风琴。她把手风琴抱在自己腿上，将空位腾给欧阳健。不用问，她是有意给欧阳健占位的。

狐狸精！

项茹梅心里狠狠骂了一句。

三

车队在鞭炮和锣鼓声中启动。项茹梅听见有人喊她的小名。“小梅子，小梅子！”她没回答，也没抬头。项茹梅不喜欢父母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喊她的名字，幸亏这一车子的同学都比她高两届，没人认识她，也没有人知道车下老两口是喊她的。

在此后的行程中，欧阳健后脑勺总是在她面前晃。尤其可恨的是那狐狸精，跟欧阳健贴得那么近，两人一直在悄悄说什么，能说什么好话？

车子终于停下。全体下车，先上厕所，然后听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话。说这里是前进人民公社，一部分人就在这里插队，其余的人继续往前。念到名字的人留下，其他人回车上。

名字念完了，有项茹梅，但没有欧阳健。欧阳健

跟留下的同学打招呼，还跟几个同学握手拍肩膀。

大家争先恐后欢喜若狂的样子给领队一个假象，以为点到名的肯定留下了，谁也没有注意到项茹梅被念到名字却又回到车上。

汽车又在土路上走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彻底停下来，因为前面已经无路可走。一座大山挡住了去路。这里就是离重庆最远的公社，居然起了一个革命圣地的名字，叫“延安人民公社”。

吃过饭又开始念名单。二十多人分配在三个生产大队。名单念完了，没有项茹梅。

项茹梅跟欧阳健那一组挤，很快就被清理出来。

项茹梅所能做的就是争取留在“延安人民公社”，和欧阳健在一个公社。她对领队说：自己要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这里比前进公社离重庆更远，更艰苦，她坚决要求留下。

她留了下来，被分配到最远的下坳大队。

延安公社共有三个大队，南坳、北坳和下坳。三个大队从南、北、东三个方向围着大山。大山是一条长长的山脉。山脉从西面连绵过来，尾巴末梢是下坳，再往东就是湖北了。

一转眼，下乡三个月了。项茹梅不娇生惯养，翻茶叶地也没觉得多么吃力。月底评工分，其他女知青6分，她年龄最小，却评了8分。

主要是劳动态度好。项茹梅干活从来不叫苦，三个月里她一次都没有请假。生产队没有星期天，谁有事跟队长打个招呼，不记工分就行了。其他女知青一到星期天就请假，项茹梅没有，老乡们认为她劳动态度最好，最能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。

其实，项茹梅根本没地方去。其他知青都有同学在南坳或北坳，项茹梅比他们低两届，一个熟人没有，不如出工挣工分。工分虽不值钱，但好过没有。项茹梅是坡坡屋出来的，晓得钱金贵。

项茹梅也想去北坳，却找不到理由。如果欧阳健在南坳，在公社的所在地，项茹梅就有理由去了。

星期天，又有两个女知青请假。项茹梅问他们去哪里，如果他们去北坳，项茹梅就假装好奇跟他们一起去，但他们说去公社，还问项茹梅去不去。项茹梅摇头，说不去。

当天晚上项茹梅就后悔了。因为他们回来，在公社碰到了欧阳健。

项茹梅星期天也开始请假，理由是去公社。也确实是去公社，目的只有她自己知道。但一连几次，去的时候雄赳赳气昂昂，回来却发现这20里地特别长。

终于有一天，项茹梅在南坳见到了欧阳健！

她不敢认，欧阳健比以前黑多了。擦肩而过之后，项茹梅转身盯着欧阳健后脑勺。欧阳健的后脑勺变化不大，还基本保持来的时候在长途车上的样子。项茹梅确认后，激动地一喊：“欧阳健！”

因为很激动，所以声音比较大，欧阳健几乎被吓了一跳，回头问：“你是……”

“我也是二中的，”项茹梅说，“初中部的项茹梅。和你坐一个车来的。”

“哦，对了，项茹梅，你在下坳，名字听说过，人没有对上号。”

“你听说过我？”

“是啊，上个月也是在这里，碰到你们下坳的几个同学，他们说下坳一共7个人，说了6个我都认识，就‘项茹梅’不认识，原来是项茹梅。”

“那是你架子大，我在学校就认识你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我最喜欢听你唱的《赞歌》。我还知道你会拉小提琴。”

“你也喜欢文艺？”欧阳健问。

项茹梅不置可否，打岔问：“你是怎么来的？”

“坐11路呀。”

“11路？”

“就是走路啊。”欧阳健说着，还抬抬腿，做了一个步行的姿势，然后问，“你是怎么来的？”

“我们队正好有拖拉机来。”项茹梅说，“要不然你跟我们拖拉机回去，去我们那里玩玩呗。”

欧阳健没有立刻答复，他看看自己身边的一位，像是在征求她的意见。

项茹梅这才注意到，欧阳健旁边还有一个女人，就是那个“狐狸精”，尽管此时项茹梅恨不能给她一脚，但还是假装热情地上去挽住倪和平的手，说：“去吧，去玩玩吧。反正坐拖拉机。”仿佛她跟倪和平早就是老朋友。

在下坳，欧阳健他们受到热烈欢迎。几个知青像过年。无奈这地方太偏僻，消费水平极低，平常村里面的小卖部的主要作用是老乡用鸡蛋换盐，连吃点酱油都是奢侈，哪里有什么好招待的？

项茹梅找出一块腊肉，瘦肉部分早吃完，剩下连着猪奶子的肚皮，想扔掉又舍不得，一直放着，都放成古铜色，没想到当天成了主菜。

项茹梅心疼欧阳健，就像母亲心疼她父亲，他们家穷，但是再穷，父亲放木排回来，母亲就是借也能借两个鸡蛋回来，给父亲弄两酒两个菜。当初母亲专门给父亲炒鸡蛋的时候，项茹梅还有情绪，现在突然理解了。好在项茹梅平常节省，身上有一些钱，早早从小卖部花七毛三分钱打了一斤红薯干酒，又拿自己积攒的肥皂找老乡换了10个鸡蛋。

那是他们下乡以来最开心的一天。一斤白酒和半斤腊肉整得下坳满村飘香，连狗都围来凑热闹。

欧阳健向大家透露，公社准备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啦。大家欢呼雀跃。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经常聚在一起。

大家又说到重庆名吃。欧阳健说自己最喜欢吃二娃子扒肥肠，听得大家满嘴生津。

(摘自《深圳故事》，丁力著，作家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)

本书，这习惯他今天还保留着。

我奶奶不忍心叫醒她的小儿子。他每天用功到深夜，星期天多睡会儿还啥时候能睡呢？但电话里的口气挺急，还是得叫醒他。

30多年后，一个人在家里接电话太寻常了，可30多年前这样的事情就不太寻常了。是的，我爷爷家有电话，公家为他安的。我爷爷是本市晚报的一号首长，每天都要用电话谈报纸的事情。当年这座城市里的电话还不多，号码仅五位数，我爷爷家的是24463，章玮叔叔喜欢用音乐简谱的方式念成“来发发拉米”。

那个深秋的早上，“来发发拉米”被什么人拨响了，我爸爸从被窝里钻出来，下了地，睡眼惺忪地去了客厅。他打了个喷嚏，我奶奶为他披上一件衣裳。

电话是我爸爸技校时代的班主任打来的，我爸爸这下完全清醒了，亢奋地向他打听农机厂的情况，用车轱辘话反复诉说着对厂子的怀念。班主任也问了问我爸爸的读书情况。一会儿他压低声音说：“大林，有件事……”

“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，”我爸爸说，“只要能办到，我拱地也给您办。”

“有一封信。”

“您可别鼓励我早恋啊。”我爸爸打哈哈说。他们年龄差距不大，技校时期关系就像兄弟。这个厚道的黑汉子作风民主，对我爸爸太赏识了，我爸爸私下里跟他讲话就有点没大没小。

班主任异乎寻常地严肃起来，说：“别逗了大林，是封匿名信。”

“有人告你技校毕业不到两年就考大学，市招生办的人都来了，昨天我去厂办大楼时听说的。你赶紧想办法吧！”

话筒里响起嘟嘟的忙音。

我爸爸望着客厅书柜上那台老式的黑色拨盘电话，半天没动弹。

那是10月的最后一个周日。上午，我奶奶家依照多年的习惯，全家人赶在冬季来临前聚在一起，把几十棵晾在楼外的大白菜一棵一棵收拾好，洗干净，装进缸里渍酸菜。那口缸够大的了，缸口直径近一米，但要把拾掇得嫩绿洁净的大白菜都装进去，也不那么容易，须从缸底一棵棵码好，塞严，不留缝隙。缸底先要撒上一些用来杀菌的大粒盐，然后铺一层菜，撒一些盐。铺到大半时，还得有人进缸里用力往下踩，这样就可以多装进几棵，使漫长的冬季里有更多酸菜可吃。

中午，全家人围坐在小餐厅里，吃着热气腾腾的菜包子，我爷爷还喝了一盅白酒。我爸爸没吃了几个就撂了筷子，我奶奶偏爱她最小的儿子，催他再吃几个，他抬屁股走了。

我二姑在他身后说：“咱家包子没他们大学的好吃。”

我爸爸把通往客厅的门狠狠摔上，磨砂玻璃碎了满地。

(摘自《把我的世界给你》，刘嘉陵著，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)



内容简介：

《把我的世界给你》为纪念恢复高考40年特别奉献。本书讲述了音乐学院研究生林晓探家时获悉，与之热恋的女友之父，竟是当年陷父亲林一木于绝境的告密者。改革开放初期恢复高考时，青工林一木考入绿江大学。一封匿名信密告他无资格就读，噩梦由此开始，他被校方除名。在众多师生可歌可泣、别具一格的援助下，他以屈辱的学籍的“黑生”名分完成剩余学业。30多年后，新一代学子林晓的恋情，仍被历史阴影所笼罩。

太美好了。

绿江大学曾是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俄文专修学校，校部主楼、图书馆、文科大楼、数理化大楼等沿街的建筑都是苏联专家设计的，门脸儿的中心顶点旗杆下一律是浮雕的五星，有的红色，有的与建筑同灰，周边环绕着镰刀锤子麦穗。

灰白色文科大楼在所有建筑中是最漂亮的，正门前典雅轩敞的雕花石柱雨搭，把守两端的圆形古堡式楼角，精致的门窗，柔和的弧形窗顶，倾长的玻璃，都有一种高贵沉静的美。

从学校正门进去向西直行，可经过文科大楼和图书馆，通道两旁多年乔木的硕大树冠纵横相连，遮天蔽日。文科大楼近边还有好多三四层楼高的松树、槐树、榆树、柳树、银杏树。我爸爸就读的中文系在文科大楼最高层，三